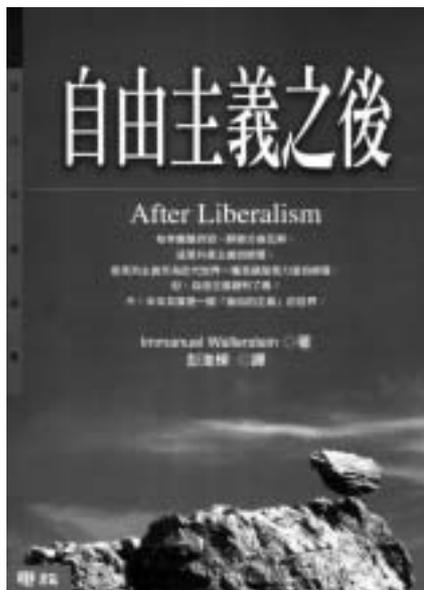


其二，一個國家又應當如何掙脫歷史的安排，在變化了的情勢下適時更新戰略文化，以利於合理作出新的外交和戰略籌劃？本文作者覺得，這兩點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特別具有現實性：當今中國不僅要關心戰略文化的連續性，也要關心其變革性。從近百年的時間來看，中國人的外交行為和戰略思維實際上是處於不斷變化中，這一點與《世紀之旅》的作者們的判斷有所區別。對於當代中國來說，與一百年前完全不同的是，中國已由一個傳統上與世隔絕、獨來獨往的「天朝大國」，演變成為世界經濟政治生態系統中的一個成員，對於一個相互糾纏的世界，中國不可能再像一百

年前一樣來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傳統資源對於今天並非全無意義，流行了上千年的「天下主義」和「文化主義」思想傳統，對於在當代世界建立國家與國家間的交往理性，仍然有着強大的參考價值。因此，當代中國人在與外部交往時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方面，如何吸收傳統戰略文化資源來為現實的戰略抉擇服務，使中國人的戰略追求不遠遠偏離歷史規定的軌道；另一方面，如何認識與把握近百多年來在外部環境、文化形態和自身實力上的改變，從而主動積極地推動戰略文化的變革，以塑造出一個新型的地區性大國和有着世界影響的普通國家。

評《自由主義之後》

● 孫善豪



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彭淮棟譯：《自由主義之後》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2001)。

「全球化」之所以會成為各種社會科學間一個共同使用的自我描述，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由於這個概念本身的模糊：「全球化」究竟何指，迄今尚無定論，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所定論。唯其模糊，所以好用。

二十世紀90年代以降，隨着蘇聯東歐垮台和冷戰結束，我們這個世界似乎已經把自己——透過許許多多社會科學家——描述成了一個

《自由主義之後》總括了華勒斯坦的基本見解與立場：雖然一般認為東歐劇變是社會主義的結束，但是從華勒斯坦看來，由於早在一次大戰之後，社會主義就已經自由主義化了，因此所謂社會主義的崩潰，其實就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

新時代、一個「全球化」時代的開端。但是，「全球化」之所以會成為各種不同的社會科學間一個共同使用的自我描述，其實很大一部分是由於這個概念本身的模糊：「全球化」究竟何指，迄今尚無定論，而且似乎也不可能有定論。唯其模糊，所以好用——一如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所說：「哪裏缺乏概念，哪裏就會適時冒出一些字眼」。

相較於此，1970年代以來華勒斯坦所創建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 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Capitalist World Economy)、「世界經濟」(World Economy) 理論，則毋寧早就以遠為清楚的概念以及立場來分析現代世界了。作為一位左翼知識份子，華勒斯坦的理論建構應該被看成是繼承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未竟事業，而在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的修正與更進一步發展。這種左翼立場的理論之難以在學界取得主流地位，固乃勢所必然，但是這一點也不能妨礙「世界體系」理論對現代世界的解釋力。尤其例如「九一一紐約事變」的突發，如果用「全球化」的觀點，可能只能將之視為一次孤立的恐怖份子的「滋事」；但是如果以「世界體系」的觀點，則這個策劃周密的攻擊毋寧是世界體系崩解的訊號、是世界體系邊陲「對現代世界體系倒行逆施之怒的高潮，目標則對準此一體系的主要受益者與煽動者，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西方核心」——美國，尤其是紐約以及紐約市內兩幢象徵資本主義的世貿大廈。

二

本書的主題，是對1990年代東歐劇變與波斯灣戰爭後的世界體系的檢討與預估。書名《自由主義之後》，總括了華勒斯坦的基本見解與立場：雖然一般認為東歐劇變是社會主義的結束，但是從華勒斯坦看來，由於早在一次大戰之後，社會主義就已經自由主義化了，因此所謂社會主義的崩潰，其實就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馬列主義……是威爾遜自由主義的一個變體。兩個意識形態其實共同信奉地緣文化的基本信條。雙方至少共同遵守六大方針與世界觀」(頁46)——主要是「國家發展」；「兩個意識形態雙雙視為己任的關鍵課題，都是如何在政治上整合世界體系的邊陲」(頁112)。在這種由「威爾遜—列寧主義」所主導的世界體系裏，蘇聯所扮演的角色，表面上是美國的對手，實際上則是美國的幫手或副手。因此，蘇聯的解體，並不是自由主義的對手社會主義的崩潰，而是自由主義世界體系本身的崩塌：它不再能維持一個穩定的世界體系了。

「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或「威爾遜—列寧主義」其實是與「世界體系」相矛盾的：後者是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分工，而前者的核心則是分立的「民族國家」、「民族自決」：它穩定世界體系的手段，是說服邊陲國家相信：只要努力——無論是採取自由市場的方式或是計劃經濟的方式——就可以迎頭趕上(頁117及其下)。換言之，經濟發展被「自由

主義—社會主義」說成了各個民族國家的內部事務，而脫離了它原本的世界經濟母體。這樣，當邊陲國家信奉其說而努力於本國建設的時候，核心國家也就努力地從中增加剝削了。在1945-70年，由於世界經濟的繁榮，這套世界體系維持了一定的穩定，造就了美國的霸權（頁46、188及其下等）。但是，隨着經濟景氣波動，70年代起，世界經濟衰退，石油輸出國家調漲油價，使得經濟衰退益形嚴重；核心國家為了安撫國內不安分階級，於是採取大量社會福利措施，而其代價則轉嫁給邊陲國家（頁161）。1980年代，普遍外債問題爆發，直接導致了波蘭團結工聯的「起義」（頁124）。影響所及，則是十年後東歐的解體——以及，我們可以補上一句：90年代末期的金融危機。

如果世界體系總是在一個霸權之下維持大約25-50年的秩序（如十七世紀的荷蘭〔聯合省〕、十九世紀的英國〔聯合王國〕、二十世紀的美國〔聯合州〕，頁20），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體系——既然美國霸權已因蘇聯這個副手的退位而朝不保夕了——會是怎樣的局面？華勒斯坦的預估是：首先，北方國家會出現「日—美—中」和「歐—俄」兩大集團（頁14、25）；其次，南方國家的貧窮化將會加速加劇（頁28），而其反應方式，或是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之路，或是薩達姆（Saddam Hussein）之路，或是人口遷徙（頁15及其下、29、263）；第三，核心國家中社會福利的縮減（頁30）或私人化（頁35）、人權和民

主的倒退（頁34及其下）；第四，國家和聯合國的萎縮：它們將不再能保障安全與福利（頁37及其下）……等等。總之，二十一世紀的確將是一個新紀元，但並不是新秩序——或全球化——的紀元，而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解體的紀元」（頁264）。

如此預估是否正確，當然要由時間來證明。真正的問題是：面對這樣的情勢，「左派勢力有何選擇？」（頁264）華勒斯坦提出了許多可能的做法（頁267及其下），而真正的關鍵則是：「與過去一刀兩斷」（頁268）、重新思考。華勒斯坦未指名地召喚了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組織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概念（英文本頁251），這是相對於「傳統知識份子」——代表統治階級進行意識形態馴服工作的知識份子——的、新興的、開創性的知識份子。這應該是華勒斯坦對自己、也對所有關心人類前途的學者的期許。

三

本書是華勒斯坦1990-93年的文章所集成。對於講求「新」和「變」的讀者來說，十年時間或許已足以使一本書的價值貶低至零，從而它的「中譯」亦顯得多餘。但是，至少有兩個理由讓這本書不符合這種俗見。第一，「世界體系」理論本身，本來就不以求新求變為能，反而強調的是一種「長期」（long duration）的觀點。因此，即使本書所評論的事件有其「年份」的限制，但是評論所

《自由主義之後》是華勒斯坦1990-93年的文章所集成。本書所評論的事件雖有其「年份」的限制，但卻是一種長期觀點——「世界體系」理論。因此，在本書裏真正要看到的，不是華勒斯坦對於各種事件作出了怎樣的評論，而是他用了甚麼觀點來評論。就此而論，則本書不啻世界體系理論的「實戰操演手冊」，而這樣的手冊，是不會「過時」的。

本書原有註明各篇文章出處，而各篇文章也附有該文的徵引書目，但是中譯兩者皆無。這對於讀者的進一步查證和研究，都是不小的妨礙。中譯本雖然花了相當功夫做了原書所無的「索引」，但是就讀者立場來說，不見得補得了缺憾。

依據的，卻是一種不會被短線操作所輕易淘汰的長期觀點。或者應該說：任何一個突發的、看似短期的事件，其實都必須放在一個長期脈絡中，才能顯示出它的意義。因此，在本書裏真正要看到的，不是華勒斯坦對於各種事件作出了怎樣的評論，而是他用了甚麼觀點來評論。就此而論，則本書不啻世界體系理論的「實戰操演手冊」，而這樣的手冊，是不會「過時」的。第二，對於中文世界的讀者來說，左翼觀點的社會科學論著永遠不會嫌多——因為它們已太過缺乏。這裏雖然主要指的是台灣，但是對於中國大陸或港澳，也未必不適用。撇開近年來大陸學界和言論界對於右翼自由主義的極力歡迎不談，即使是所謂「老左」，他們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左的」，反而，正如華勒斯坦所指出：列寧以降的社會主義，不過是自由主義化了的社會主義而已、是形左實右的。因此，對於長久以來右傾的中文學界和言論界來說，這本有着知名作者「品牌保證」、而又由具有相當規模和權威的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毋寧至少具有「平衡報導」之功。

不過，即使有意義，這本中譯本卻仍然有其缺陷。

首先，本書原是文集，但是中譯本將各篇文章標上章次，使得它看來像是一本有系統的專著。此舉或許有其行銷策略上的考量，但是對讀者來說卻不公允。因為讀者對一本章節井然的專著的期待，顯然不同於一本文集。

其次，本書原有註明各篇文章

出處(Acknowledgments)，而各篇文章(隨其徵引方式)也附有該文的徵引書目(Bibliography)，但是中譯兩者皆無。這對於讀者的進一步查證和研究，都是不小的妨礙。中譯本雖然花了相當功夫做了原書所無的「索引」，但是就讀者立場來說，不見得補得了缺憾。

第三，譯者雖然以譯筆洗練通暢著稱，但是本書中的誤譯、漏譯，卻並不少見。舉例而言，原文的“capital ‘L’ Liberals”(頁97)，本是「大寫L開頭的自由派」之意，中譯誤為「資本家自由派」(頁98)；原文的“main semiperiphery”(頁20)中譯為「主義半邊陲」(頁14)，「主義」或是「主要」之誤，但若不對照原文，就很容易以為有個「ism-semiperiphery」；原文的“political activists”(頁24)中譯為「政治科學家」(頁18)；原文的“Are libertarians liberals?”(頁93)本為「放任自由主義是不是自由派？」之意，中譯為「文化自由主義這個範疇要如何處理？」(頁94)使人莫名何指；毛澤東的“protracted struggle”，中譯為「拖延鬥爭」(頁115)，其實不如依中文原文譯為「持久戰」。此外，原文若干句子，例如頁22，1.9“(say Vietnam)”，頁23，1.6“and this South-to-North migration will come on top of authorized and unauthorized migration from Russia and China”，頁27，1.32“(the sharp diminution of that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deterministic equations)”，在中譯裏(頁16、17、22)都不知何故未譯。不過，這裏並不是檢討翻譯的適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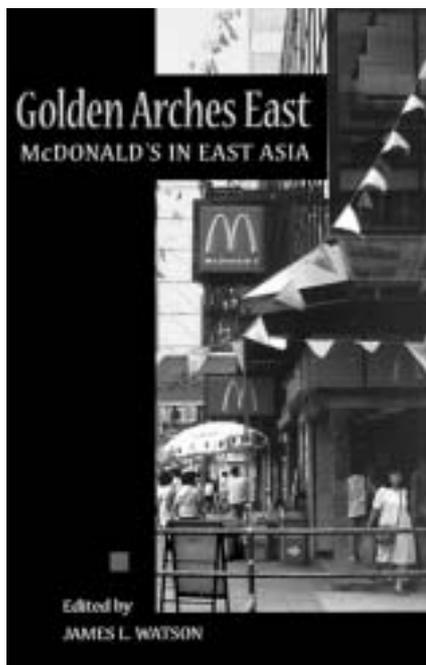
地方，因此舉例到此為止。要指出的是：如果讀者在中英對照後發現了任何翻譯上(即使無關宏旨)的問題，那麼立刻就會對這本譯本產生不信任，而寧可直接讀原文了。這將大大減損「翻譯」的意義，從而也會對中文學界的以中文消化西方理

論、從而「擺脫邊陲化」造成一定的損傷。

有鑒於此，這本中譯本——和目前許多其他的中譯書一樣——應該被當作一本優良著作的優良中文工具書：雖不足以取代原文，卻是中文讀者閱讀原文時很好的參考。

地方化與麥當勞的成功

● 何蘭萍



James L. Watson, ed.,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在這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織並容的時代裏，源於美國的麥當勞，不失時機地來到以飲食著稱的東亞，隨後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1997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華生 (James L. Watson) 主編的《McDonald's成功傳奇：跨文化經營啟示錄》(中譯本於2000年由台灣經典傳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以下簡稱《McDonald's成功傳奇》，文中所引頁碼依英文本)，該書分析研究了麥當勞在東亞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從麥當勞適應東亞社會和東亞社會對麥當勞的改造這兩個方面闡述了麥當勞在東亞所經歷的地方化過程。

按照《McDonald's成功傳奇》的分析，麥當勞之所以在東亞社會獲得成功，原因有三：一是麥當勞自身的技術優勢；二是東亞民眾認可麥當勞的形象；三是麥當勞積極融入當地社會的地方化策略。

《McDonald's 成功傳奇》分析研究了麥當勞在東亞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原因有三：一是麥當勞自身的技術優勢；二是東亞民眾認可麥當勞的形象；三是麥當勞積極融入當地社會的地方化策略。